

SHE JIAN SHI
YANJIU

苏联史研究

李冠乾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世界史和苏联史教学和研究辛勤笔耕成果的一部分，专辑苏联史研究的一本专集。全书收文19篇，分六个部分，论及十月革命、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其人及其理论透视、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伟大的卫国战争、赫鲁晓夫五六十年代的改革、9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等重大事件。所论专题时间跨度75年（1917—1991），贯穿苏联一代历史兴亡，但不是全部苏联兴亡史的评述，而是通过一些焦点问题来研究和展现苏联一代历史的兴衰。各篇文章论题鲜明，提纲挈领，条理分明，有事实，有理论，评说中肯，对读者了解苏联兴亡提供有益启示。既可供专业工作者参考，也可供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读者阅读。

目 录

《苏联史研究》序·····	吴恩远 (1)
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	(4)
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与条件·····	(12)
论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24)
论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37)
论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53)
论租让制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	(69)
论苏俄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意义·····	(87)
布哈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11)
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评析·····	(137)
布哈林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捍卫者·····	(152)
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探析·····	(168)
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对苏联的影响·····	(185)
苏联建立“东方战线”的是与非·····	(196)
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208)
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评析·····	(219)
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历史地位·····	(230)
苏共蜕变与苏联解体·····	(247)
民族危机与苏联剧变·····	(260)
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	(273)
后记·····	(290)

《苏联史研究》序

吴恩远

20世纪末苏联的剧变，震动了全世界。一个存在了70余年的泱泱大国，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况下，顷刻间土崩瓦解。人们都在思索：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严酷的现实更使人们惊醒：应当从苏联解体汲取什么教训？

毫无疑问，是综合因素，是历史的合力促成了苏联剧变。诚如本书作者正确指出的：苏联解体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因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因素……。当然，如果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戈尔巴乔夫所奉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直接导致了苏共瓦解和庞大苏联帝国的崩溃，这一点已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公认。但是——我仍然要强调这个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们把苏联解体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过程”来观察、比较、分析，不难发觉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渊源和密不可分的联系。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一段历史，而且是曾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演出过如许轰轰烈烈、悲壮激越场面的一段历史，将会如同法国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长久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李冠乾先生这本《苏联史研究》的出版，正是这方面研究领域的一个成果。

李先生多年从事世界史和苏联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积十余年辛勤笔耕心得，合十九篇专题研究论文，成一苏联史研究专集。全书分六个部分，从十月革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3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卫国战争、60年代的改

羊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不是全部，但也基本包括了苏联史上的主要历史阶段和重大历史事件，说明作者试图通过苏联史一些焦点问题的研究来展现苏联兴衰的过程。

粗读全书，感到全书至少有如下特点值得笔者学习：第一，作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具体分析历史问题，使全书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分析颇具功力；第二，作者在占有材料基础上，不囿于一般学术上的看法，能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力求探索新意，且言之有据、有理；第三，能处处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来比较、分析和总结苏联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深化了苏联史研究的课题，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总结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教训，以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通读全篇，作者力图借鉴历史经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服务的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第四，各篇文章虽独立成篇，但涵盖面广，提纲挈领，展示了苏联70余年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对读者了解苏联兴亡提供有益借鉴，且叙述脉络清晰，条理分明，有事实，有理论。

无可讳言，由于苏联剧变属于才发生不久的当代历史事件，距离现实太近，这就为历史学家准确把握历史事件，尤其准确评价历史人物增加了相当难度。然而对这段震惊世界的历史的研究，无论就理论性、现实性、学术性来说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比很钦佩李先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正因为如此，对作者所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有可商榷之处。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设想的一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也没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列宁大胆提出在过渡时期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因而实行了以粮食税、租赁制、租让制为

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交换，极大地活跃和恢复了苏维埃经济。然而囿于时代局限和列宁过早逝世，当时列宁没有也不可能把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联系在一起，他更多是出于考虑利用这些“资本主义因素”。列宁晚年提出的一句十分著名的口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列宁思想中“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距离。说明这一点丝毫无损于列宁的伟大，反而有助于了解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艰难，也有助于了解30年代苏联中止新经济政策表面上遵循了列宁的思想，实质上是丢弃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列宁主义活的灵魂。本书对此似乎阐述不多。当然史学界看法各异，笔者也仅一家之言。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改革等问题也是苏联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反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个人崇拜”，改革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无疑是必要的，也必须对这一事实本身给予一定评价，但要充分注意到事物的另一面。苏共二十大路线中的阶级调和思想，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作者在书中已正确指出这一点）造成的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以及对苏共党的影响，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戈尔巴乔夫等人就被称之为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产儿”，而戈氏的“改革”却直接葬送了苏联。问题难度就在于如何准确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及其举措。在历经苏联剧变后，再回过头来分析苏联史上的一些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近年来，俄罗斯史学界已披露了不少新史料。如果本书再版时能注意并补充这些新材料，将会使论著锦上添花。

1996年1月15日于北京
海淀稻香园

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

列宁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俄国十月革命“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超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东西”^①。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本身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英、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在前的巴黎公社革命和在后的欧亚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内外一些史学家因对十月革命本身的特殊性和特点注意不够，容易得出片面的看法。其中，有一些人简单地把十月革命仅仅看作暴力革命的胜利或武装起义的胜利，把十月革命说成暴力革命的典型^②。有的人则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人民不经流血而战胜资产阶级的光辉榜样”^③。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十月革命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联贯在一起，二月革命为十月革命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发展和继续。另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② 参见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83、162页；史义人编：《国际共运史疑难问题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

③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24页。

外一个特点是和平合法的斗争和武装起义相结合。前一个特点史学界已基本定论。后一个特点尚有必要进一步分析。

十月革命之所以具有和平的合法斗争同武装起义相结合的特殊形式和特点，是二月革命以后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

1917年2月至7月初，革命是和平发展的。以和平的合法斗争为主要形式。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非常罕见的政治局面，那就是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属的、监督性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绝大多数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①”

一国之中不可能两个政权长期并存，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当时的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制定新的方针。这个新方针在列宁的《四月提纲》里提出来了。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是实现由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使政权全部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实现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单一政权。为了实现这一革命转变，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就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其主要内容做法是：首先，布尔什维克党要揭露、批判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和所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实质，揭穿它欺骗群众的谎言。不给它任何支持。其次，要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使它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从实践经验中纠正自己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39页。

策略的错误，认清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组织群众为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斗争。第三，扩大和增加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和比重，剥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窃取的权力，使苏维埃完全致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①。

列宁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为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接受。全党展开了和平的合法斗争。用革命精神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街道、工厂、兵营、出席各种群众大会，发表演讲，进行辩论，向群众解释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揭露临时政府各种反人民的政策及其反动本质；批判小资产阶级政党推行妥协政策的危害性。此外，布尔什维克还采取各种方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主要是建立各种苏维埃。二月革命后苏维埃在大、中城市广泛建立，到5月，全国已有400个，8月达到900个。

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群众开始摆脱对临时政府的轻信，起来反对它的战争政策。从而造成临时政府的三次危机。其中“七月流血事件”表明，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存在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条件已经消失了。从此，进入了7月至10月十月革命的非和平发展时期。

形势的骤变使布尔什维克迅速改变了革命方针和斗争方式，在7月底秘密举行的党的“六大”上通过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定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利用一切可能把和平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以巩固革命阵地，同时用和平的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

8月，当科尔尼洛夫发动反革命叛乱时，布尔什维克挺身而出，组织首都工人、士兵粉碎了这次反革命阴谋。从临时政府的三次危机到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已雄辩地证明了列宁关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动员人

^①参见徐天新、严志明主编《世界现代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民群众的强大武器。在列宁思想的召唤下，和平的合法斗争已取得辉煌的成果。列宁曾对十月起义前的和平合法斗争给予很高的估价。他指出：我们把克伦斯基政府、米留可夫联合内阁弄得狼狽不堪，可以说是任意摆布他们，让他们坐在每届内阁的部长席位上，迫使他们左右为难，不断地更换议员。结果无论他们怎样坐，他们都不配当音乐家^①。成了一些轻飘飘的绒毛。可见，那些把十月革命仅仅看作暴力革命的人，既违背客观的历史事实，也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片面的理解。有人根据列宁关于“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名言，把十月革命归结为暴力革命的典型，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归结为暴力革命的道路。起码这是把列宁的思想简单化了。请看列宁的原话：“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群众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了；第二，因为敌人即资产阶级经过2月至10月这一漫长的政治时期，已经像春水冲击下的冰块，摇摇欲坠了，站不住脚了，它已经外强中干了。……可不可以设想，没有这些条件，也不能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斗争形式也能轻易获得革命暴力的胜利呢？这样设想，将是极大的错误。”^②这一段话，列宁明确地指出了两种斗争形式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准备和实行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以“七月流血事件”为转折，该事件前，是以和平合法斗争为主。该事件后，虽然是以准备实行武装起义为主，但没有放弃和平合法斗争，而是以和平合法斗争掩护武装起义。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当布尔什维克党集中全力准备武装起义的斗争时，9月上旬，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被迫进行了改组。9月14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等五人组成的“执行内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害怕失掉群众，在“执行内

^①列宁关于“无论怎样坐也不配当音乐家”一语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四重奏》。

^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37页。

阁”成立前夕，声明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政府，列宁立即写了《论妥协》一文，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①，并“以政党的资格”表示了准备向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党派妥协，提出了妥协的具体条件。列宁深知这种情况只能维持极短的时间，但还是抓住这个“假如还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来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很快又决定支持“执行内阁”遂使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丧失。到了9月下旬，布尔什维克已在国内主要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苏维埃中争得了多数，面对这个新的变化，列宁在10月9日发表了《革命的任务》一文，又力图抓住革命和平发展这个“最后一个机会。”他说：“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只要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就会和平地交出政权。”^②但是这“最后一个机会”又被妥协党拒绝，克伦斯基加紧从前线调动部队，积极准备镇压革命。这样，武装起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以上可见，列宁并不是暴力万能论者。相反，他坚决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轻举妄动，即使党在7月底到8月初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方针，但列宁仍然没有号召立即行动。而且，党虽然转入半地下状态，并未放弃和平的合法斗争。列宁最善于及时变化革命斗争策略，只要稍有革命和平发展之机，总是抓住不放。

经过近七个月的和平合法斗争，只是到9月中旬以后，列宁才认为“危机成熟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当武装起义的条件完全成熟以后，列宁认为“等待会丧失一切”^③，“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④。10月10日、16日，列宁主持召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31页。

② 《列宁选集》第8卷第392页。

③、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430、431页。

党中央会议，通过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建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列宁要求党中央把起义当作一门艺术。他制订了周密的起义计划，亲自听取并检查起义的准备情况。起义是列宁亲自领导的。但具体的行动却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合法机关指挥。列宁把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24日全俄第二次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之前，要在大部代表已经到来、会议还未决定以前拿下政权，一方面可以在准备和保卫这次大会的口号掩护下准备和举行起义，另一方面政权拿下后就可以立即交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之完全合法化。由于10月起义经过了充分的准备。由于各种形式的斗争有机配合，因此很顺利地取得了震撼世界的胜利。

至今有的人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人民不经流血而战胜资产阶级的光辉榜样”，笔者认为是不科学的。一方面，它违背了列宁关于“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教导；另一方面，它不符合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这里只须列出十月革命过程的某些片断便可得到证实。“1917年10月24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了。酝酿已久的阶级大搏斗终于来临，革命武装同反革命武装开始短兵相接。”“彼得格勒战斗打了一个通宵，至25日清晨，邮政总局、电话总局、火车站、发电站、国家银行、国家机关、企业仓库和许多重要战略据点，均被起义队伍占领”^①。

10月25日“晚上九点四十五分，‘阿芙乐号’巡洋舰打响了冲击冬宫的炮声。从彼得——保罗要塞也传出大炮的轰鸣。接着，在冬宫广场的侧面，起义队伍的野炮发出实弹射击，炮弹打在冬宫的飞檐上，火光四射……而防守冬宫的反革命军队，亦拼命发出密集的射击”^②。“在赤卫队中亦有不少女工，有的在冬宫

^①参见欧正文、杨兴华《世界现代史问答一百题》第25、27页。

^②参见孙成木等《十月革命史》第136页。

附近抢救受伤的革命战士，有的给冲击部队运送食品。为了攻下冬宫，她们亦走向枪林弹雨之中，置身于刀光剑影之下。无所畏惧”^①。深夜一点钟，起义队伍终于冲破冬宫大门，高呼“乌拉”，如山洪海啸般涌进皇宫大厅。但临时政府还是拒绝投降和进行垂死挣扎。它命令士官生疯狂抵抗。所以，在冬宫里，起义队伍又同士官生经过了约一小时的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深夜二时十分，战斗方告结束，夺取冬宫的任务胜利完成”^②。“以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中夺取冬宫的战斗来说，虽然伤亡不大，但还是牺牲了一些人。所以，彼得格勒的十月武装起义不是没有流血的，而是一场流血的革命”^③。

至于莫斯科起义，比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还艰苦得多、剧烈得多。它经过六昼夜的激烈战斗，才取得胜利。十月革命的目击者约翰·里德亲眼看到在莫斯科战役中五百个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同志被安葬的盛大和悲壮情景^④。约翰·里德还曾为在十月革命中牺牲的同志写了悼诗：“安眠吧！战斗的雄鹰！静心地安眠！至亲的人们，你们配享这光荣与永世的安宁……”^⑤。

和平的合法斗争同武装起义相结合，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特殊形式和特点之一。通过对它的分析，我们能从中得出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必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善于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非法的、议会的、群众的、公开的、秘密的、武装的与和平的斗争形式，并且按照实际情况，随时准备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有时用暴力的，有时用和平的，有时两者兼用之。这样，才能做到策略灵活多变，随时都有力地打击敌人。1956年12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再论无产

①②③参见孙成木等《十月革命史》第136—137、137、138页。

④⑤[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3—257、226页。

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一提法是完全正确的。“革命手段”正是上面所阐述的斗争形式，它并没有把十月革命的道路简单地归结为暴力革命的道路。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带领苏俄军民，正是采用和平的合法斗争同武装起义相结合的方式，最后夺取了政权的。十月革命的历程表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或方式）是多样性的，绝不只是一种“模式”。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现成的千篇一律的策略公式，不能期待有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唯一的办法是：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最灵活的斗争策略。

第三，无产阶级用什么方式去取得政权，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际的问题。它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各国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条件等等，而不是取决于教条和根据简单归纳所得出的结论。

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与条件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发现，他们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都肯定了革命存在暴力革命与和平发展两种方式，他们是辩证地看待这两种方式的。至于决定无产阶级两种革命方式的条件，理论界和史学界迄今未有统一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之所以必须要采取暴力的形式，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使用暴力；另一种观点认为，革命之所以和平发展，取决于人民是否仍然保有民主权利，资产阶级首先对人民使用暴力后，人民丧失了民主权利，社会实质上回到了专制时代，所以，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不妥当的，它既不太符合唯物辩证法，又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笔者的浅见是：无产阶级采用不同革命方式的关键，取决于革命所赖以进行的条件，其中主要的就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力量对比转化的形式。

一

无产阶级采用不同革命方式的关键取决于什么？笔者认为，暴力革命与和平发展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革命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在存在政治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既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也可能采取暴力

的方式。采用不同革命方式的关键取决于革命所赖以进行的条件。在某些条件下，革命过程会采取暴力的方式，在某些条件下，革命过程则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而这些条件又是可以通过分析来严格而清晰地把握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性质的变化取决于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的转化，而主要矛盾的变化又取决于这个矛盾内部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互相转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斗争转化就推动着社会性质的转变，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笔者认为，不仅社会性质的转变取决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次要方面的互相转化，而且社会性质转变的方式（即革命的方式）也取决于这个主、次要方面转变的方式：当革命力量（以无产阶级为领导）迅速增长的同时，反革命的力量（以资产阶级为代表）并不明显减弱，或者甚至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革命将采取暴力的方式；当革命力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反革命力量也急剧衰竭以至革命力量在较短时间也压倒了反革命力量条件下^①，革命将采取和平发展的方式。俄国十月革命的进程属于前一种情况。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进程属于后一种情况。下面，笔者将着重分析这两个进程，以说明这个论点。

我们先来看看俄国十月革命的进程。

俄国十月革命后，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工业中心广泛建立起来。例如，三月份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就达400多个。当时，工人群众继续保留着大量的武器，军队里广大士兵群众也已革命化，他们绝对不会服从任何镇压人民群众的命令，这说明武器完全掌握在人民手里。因此，在士兵听从苏维埃号召，工农也完全团结在苏维埃周围（他

^①这个条件已经暗示我们，革命向和平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伴随有两个政府并存（也就是哲学上的极端共存）的局面。

们构成了人民的绝大多数），临时政府完全没有力量公开反对苏维埃的情况下，以苏维埃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完全压倒了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如果这时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苏维埃声明要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反对，因为那时“俄国没有一个团体，一个阶级能够同苏维埃政权抗衡”^①。正是在这种革命力量增长到极为强大，而反革命力量十分虚弱的条件下，革命出现和平发展的可能。

然而，在一个革命的非常时期，各种阶级关系是不停地在变动的。“七月流血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表明了原来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的第一次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只占了少数，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党只有105名，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代表总数中占70%强，他们把持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还获得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完全支持。因此，当他们完全转到反革命的阵营中去时，必然要使革命力量丧失了原来所占的优势，而使反革命力量大大加强并压倒革命力量。正因为他们“七月流血事件”前完全转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一边，资产阶级才敢于在七月公然镇压革命力量，致使革命人民在二月革命中所争得的相当一部分民主自由权利被重新剥夺。“七月流血事件”表明了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结盟）。这时虽然在表面上仍然存在两个政权，但由于把持着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已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去，因此，“七月流血事件”表明“政权基本上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②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

粗略看来，在革命的这一阶段，革命不再可能和平发展的原

^① 《列宁选集》第8卷第101页。

^② 《列宁选集》第8卷第109页。